

楊成吳先生訪問紀錄

受訪時間：2013 年 11 月 5 日，

15：00-17：30

受訪地點：臺北市寶興街楊宅

訪談人：李福鐘

紀錄：謝季剛



受難人資料

受難人/案件/判決書年齡	職業/經歷	刑期	與受訪者關係
楊成吳 臺北市工作委員會郭琇琮 等叛亂案 24	農	有期徒刑 12 年 褫奪公權 7 年	當事人
案情概況	楊成吳先生， ¹ 1927 年生，臺北市萬華區人。據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書記載，楊成吳係於 1949 年 11 月參加叛亂組織並三次參與集會，同時並介紹他人加入，被捕後供認不諱。		

國民政府接收

我在 1927 年 10 月出生於今臺北市萬華區東園街，家中歷代務農。

先從臺灣光復後的情勢說起。我阿公是個民族意識很強烈的人，他常告誡我

¹ 目前蒐集到楊成吳先生的相關資料，為臺灣省保安司令部（39）安潔字第 2204 號判決書，以及沈懷玉訪問，曹如君紀錄，〈楊成吳先生訪問紀錄〉，收入《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口述歷史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1999 年 6 月），頁 129-143。本文於上述相關資料基礎上進行訪談，與之前已受訪出版品不同之處，主要在對於與李蒼降、朱耀【山加】等案情關鍵人物之來往互動，以及私人關係，作了比 1990 年代更多且更詳細的描述。

們：「我們是中國人，不是臭狗仔！」²阿公年少時家境不錯，和兄弟們一起請了漢文老師教漢字，所以漢文造詣很高，也影響了他的民族認同。我在十八歲左右時因為抽籤抽中，被日人徵召去當學生兵，幫日本政府做一些雜役工作，當時日本敗象已露，兵源不足。記得我返回家門前，都要將學生兵的日軍小帽摘掉，才敢入門，不然阿公會大發雷霆。阿公被日本人欺負的很慘，曾經一度差點被逮捕，為此跑去唐山（中國大陸）避風頭，事後才返臺。

正因對日本人的怨恨和強烈的民族意識驅使，光復後阿公非常興奮，在家裡埕院，自動自發買了好長一串鞭炮來放，慶祝回歸祖國，而且激動得熱淚盈眶。阿公還帶著我們到基隆港迎接國軍部隊上岸。國軍部隊抵達基隆的時候，很多人嫌國軍衣衫不整，軍容不佳，但是阿公反而幫國軍講話，覺得他們很辛苦很可憐，在衣食物資匱乏的情況下，不應加以責備。

李蒼降與朱耀【山加】

之後不久我在臺灣省教育會的指定公司「太懋有限公司」服務，這家公司專營學生制服和蠟筆、粉筆的生產，我就是在公司裡結識了公司會計李蒼降。李蒼降是李友邦的姪子，這層關係我直到認識他之後才知道。李蒼降學生時代就很反日，被日本人關押到光復後才獲釋。聽人說，他的叔叔李友邦在光復後曾經送他到廈門唸大學。

政府接收之後的種種政策措施造成民心浮動，社會上很多人憤恨不平，例如國軍軍紀敗壞，為非作歹，各式各樣的不滿逐漸累積，每個人聽到的都是負面的消息，一般民眾對政府的印象很糟糕。我在太懋公司服務時，有時候會聽到李蒼降議論，他談到大陸上國民政府如何腐敗，以及地主權貴等「剝削階級」的惡行惡狀。我並不知道他有加入什麼組織，但我之所以被抓，就是受李蒼降的案件牽連，他已經在白色恐怖時期被槍決。

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前，有一天一位朱耀【山加】醫師來找我，他自稱是李蒼降的朋友，特地來拜訪我。他還告訴我，李蒼降已經搬到基隆去了，所以從此以後，我再沒有見過李蒼降。朱耀【山加】跟我閑談時，特別提到大陸中共統治地區如何如何進步，我當時聽了心裡有所警覺，感覺怪怪的，所以實際上我也儘量

² 「臭狗仔」是當時臺灣人辱罵日本人的詞語。

跟朱耀【山加】保持距離，不想太過密切。透過我，朱耀【山加】又認識了呂聰明和潘水匱二人。呂聰明、潘水匱和我三個人事實上是鄰居和朋友。後來朱耀【山加】被逮捕，我和呂聰明、潘水匱才因此牽連到他的案子裡。

二二八事件

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時候，臺北市宣布戒嚴，大部份人都待在家裡不敢出門。當時我剛好在太懋公司的工廠值班，工廠裡沒有東西可以吃，餓得受不了，於是我離開工廠往公司去，看看能不能在公司裡找到米或食物。結果走到大橋，³路的這邊是太平國小，對面是永樂國小，我往左邊一看，馬上看到地上躺著幾具遭槍殺的屍體，路口還架著機關槍。這時候有一位中尉軍官看到我，用臺語對我喝斥：「現在都戒嚴了，怎麼不待在家裡，還在街上隨便走！」這個軍官可能是廈門人，總之，他會講臺語，可以跟我溝通，否則，說不定當場我就被槍殺了。這名軍官問我上街幹嘛，我說在工廠值班沒東西吃，想走到公司去。他問我公司在哪裡，我指著前方說就在不遠的地方。在他的護送下，我平安過了大馬路，⁴來到公司之後嚇得不敢再出門。公司裡的人見外頭情勢緊張，勸我不要回家，於是我住在公司裡，四、五天才走。

二二八事件之後，臺灣人對政府的不滿更為加重，加上軍隊胡作非為，回歸祖國的興高采烈已經煙消雲散。而且後來「四萬元換一元」的幣制改革，⁵造成人民極端不滿。

青島東路軍法處

二二八事件之後，我應該就沒再見過朱耀【山加】，所以 1950 年保密局來抓我的時候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原因抓我。後來聽說李蒼降因為基隆中學案子被槍斃，我才懷疑就是因為李蒼降介紹朱耀【山加】來找我，我和幾個朋友才被牽連

³ 指今日連接臺北市民權西路與新北市三重區的臺北大橋。

⁴ 即今日延平北路二段。

⁵ 指 1949 年推行的新臺幣改革，舊臺幣四萬元兌換新臺幣一元。幣制改革使臺灣民眾財產受到嚴重剝奪。

進來。我這個案子是所謂的臺北案件，⁶五十幾人當中槍斃了十幾個，而我則被判十二年刑期，從二十四歲起被關到三十六歲，可以說是一生中的黃金歲月卻在監牢裡頭度過。判決書說我參加「組織」，我要再次強調自己雖然對於政府相當不滿，但我絕對沒有參加任何地下組織。

李蒼降的案子比我的案子要早宣判，當我被羈押在青島東路軍法處時，每天早上和下午，牢房內的獄友都要輪流將屎尿桶拿出去「倒屎尿」，有一次倒屎尿的時候，碰到一個人問我是否認識李蒼降，他傳口信叫我隔天早上想辦法出來倒屎尿，說李蒼降想利用這個機會跟我說一些話。但是隔天早上我還來不及換班，已經排定的獄友就搶先一步將屎尿桶拿出去倒了。等到下午出去倒屎尿時，已看不到李蒼降人影。後來，就聽說李蒼降被槍斃了。李蒼降想跟我交代什麼，我大概知道，無非就是他並沒有供出我的名字，這樣我就不會牽連到他的案子裡。

在軍法處的時候，死刑犯都是一大早就被叫出去槍決，大概是早上五點就開始叫名字，好像殺雞一樣，實在可怕。等到叫完名之後，沒被叫到的人才開始輪流大小便，出去洗手臉。但就算那天沒被叫到，難保隔天不會喊到自己的名字，日復一日在那種隨時可能被槍斃的恐懼中生活，真的是恐怖，真的恐怖！那時接二連三在槍斃人的時候，情況就是這樣。

保密局

保密局來抓我時，是利用戶口調查的名義來敲門，大概在凌晨三、四點，天都還沒亮就到我家。我想，他們就算逮人也還是有所顧忌，怕被其他人看到。他們的車子就在外面路口待命，應該至少有三個人到我家裡來抓我，一開始我並沒有被上手銬，就是兩個人把我架住，直到走到外面馬路口，準備要對我上手銬時，我反抗說又沒犯罪，為什麼要戴手銬？這時一個人猛的朝我胸口進行肘擊，害我肋骨斷掉，我痛得大聲哀號。接著有一個穿著制服的帶隊軍官揮揮手，阻止其他人再毒打我，然後在我的頭上戴上布套，就上車載走。我先在保密局接受偵訊，然後送到國防部軍法處宣判，之後再送到新店一家由戲院改裝成的拘留所羈押。那家戲院的名字好像就叫新店戲院，因為老闆牽扯到某個案件，戲院遂被沒收，

⁶ 保密局所正式定案的名稱是「臺北市工作委員會郭琇琮等叛亂案」，見國家安全局編印，《歷年辦理匪案彙編（第二輯）》（臺北市：李敖出版社，1991年12月），頁14。

改成拘留所，內部隔成一間間的囚室。

我剛被抓到保密局的時候，經常聽見有人被刑求的哀號聲，非常可怕。但我的胸口受傷，反而幸運地讓我免於被刑求，審問的人看到我的傷勢，胸前一大片瘀青，便沒有再對我動手，也許他覺得再刑求的話我會死掉吧！我一再回答我沒有參加組織，只是因為工作關係，才認識李蒼降，然後李蒼降又介紹朱耀【山加】給我，至於朱耀【山加】來找我做什麼，主要是來到我家附近淡水河邊釣魚、摸蛤仔。這麼講當然是為了騙過偵訊人員的胡謔。我到保密局時，兩個朋友呂聰明跟潘水匱已經先被抓進去了，後來他們兩人一個判了十五年、一個判了十年，現在兩人都已經過世。出獄後我才知道原來呂聰明供稱我吸收他進入組織，這是子虛烏有的。我其實不太清楚他們兩位跟李蒼降和朱耀【山加】接觸的程度，朱耀【山加】雖然透過我才認識呂聰明和潘水匱，但他們之間的來往情形，我完全不清楚。二二八事件之後我離開太懋公司，改在一家營造廠工作，這家營造廠在蘇澳開礦，因此我經常被派到蘇澳管帳，對於呂聰明他們和朱耀【山加】是否有往來，我真的不清楚。

我從來沒加入任何組織，是保密局的審訊人員在口供上亂寫的。在保密局羈押期間，我的胸口傷勢惡化，紅腫瘀青非常嚴重，因為缺乏醫療資源，同房獄友建議我喝尿療傷。我在保密局前後喝了一個月的尿，瘀青才漸漸褪去。不過或許就因為這樣，逃過了刑求的噩運。保密局在問完口供之後，直接拉我的手去蓋手印，也沒讓我看內容。最後判決書上居然寫我加入非法組織，意圖顛覆政府。

綠 島

離開保密局之後送到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等候宣判，宣判後再到新店的戲院等待發監執行。等到後來要送到綠島，準備到基隆搭船，那時犯人兩個銬在一起，用車先載到松山車站附近的一個倉庫，然後再到基隆上船。上船後我們不知道要去哪裡，心裡很恐慌，還以為要被載去填海！當時已經有不惜拼命的覺悟。後來輾轉到了綠島，島上的百姓都被灌輸我們是群殺人放火、罪大惡極的凶神惡煞，一再告誡不可與我們接觸。

我在綠島一共服刑十一年多，被編在第五隊，因為我是農民出身，懂得耕作技術，因此被指派種菜工作，以供應隊上食用。剛到綠島時，島上因為缺乏蔬菜，

只能吃配給的黃豆，結果導致大家經常性牙齦流血發炎。為了解決這個問題，大家討論之後決定成立一個「生產組」來種植青菜。因為我是農村子弟，遂被編入生產組，帶班的則是我的鄰居兼獄友潘水匱。潘水匱因為判十年，比我早兩年出獄，所以潘水匱離開綠島之後，便由我擔任生產組的帶班。我的組裡有個臺大地質科的學生葉雪淳，⁷我回臺灣之後帶班一職便交接給他負責。葉雪淳已經過世，我們這一群綠島難友凋零的人數越來越多，我快九十歲了，畢竟來日不多，最近一直犯腸胃的毛病，但我連去醫院檢查都不想，反正終究難免一死，該來的還是要面對，況且我已經多活了那麼多歲數，沒啥好遺憾的了。

加入生產組，相對來說比留在隊裡自由，我們的菜園在山上，每天生產組的幹部帶我們上山，衛兵再監督我們下山，在山上的時候管制不那麼嚴格，精神上的壓力也減少許多。葉雪淳被編入我們生產組之前，原本在三隊負責養火雞，由他跟另一位臺大法科畢業的林從周負責，⁸但過沒多久，火雞全死光了。他跟我表達想轉到生產組的意願，但因為把火雞養死這件事給管理人員留下不好的印象，我們的中隊長對於肯做事的人比較喜歡，混水摸魚的則會留下不良印象。當我的刑期只剩一年時，生產組因為有人刑滿回臺灣，於是有兩個缺額必須補人，一位姓劉的生產組幹事詢問我誰適合，我便報上葉雪淳跟林從周。幹事驚訝道：「這麼多人不要，偏偏選他們倆！」幹事質疑他們把火雞都養死了，怎麼能勝任生產組的工作。我用身為農村子弟的經驗提出解釋，因為秋風起時，火雞的存活率會下降，很難飼育照顧。又替他們兩人講好話，說他們平日在路邊撿到番薯，會自動自發拿到隊上豬圈餵豬，對生產組的事情很關心。何況，如果找不熟的人進來，反而造成我的負擔。幹事聽了覺得有道理，便同意他們兩人加入。

我們為了種菜，特地在山上砍樹用木頭搭了一個工寮。後來葉雪淳十五年刑期結束後，有來找我，跟我說搭在山上的工寮被火燒得精光，因為有一次他們冬天在工寮生火取暖，沒有用鐵皮把火圍起來，一不小心就把工寮給燒了。

我們通常用過早餐之後，要挑糞肥上山去灌溉菜園，而隊上的其他人則要到海邊撿硧咕石建「萬里長城」，也就是後來新生訓導處的圍籬。原本新生訓導處

⁷ 葉雪淳，新竹人，原就讀臺灣大學理學院二年級，因「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學委會李水井等叛亂案」被捕，判刑十五年，參考國家安全局編印，《歷年辦理匪案彙編（第二輯）》，頁 93-105。

⁸ 林從周，臺北人，臺大法學院畢業，亦因涉入「臺北市工作委員會郭琇琮等叛亂案」被捕，判刑十五年，被捕時任職於臺灣銀行會計室。參考國家安全局編印，《歷年辦理匪案彙編（第二輯）》，頁 20。

沒有圍牆，只由一座座衛兵看守的碉堡圍住。蓋圍牆，就是將一個又一個碉堡連接起來，最後把新生訓導處團團圍住，只留下一個大門作為出入口。咾咕石圍牆高約九尺，⁹每隊派一名公差一早就去打石頭，打完石頭回來才吃早飯。一開始剛到綠島時，海岸邊盡是高低崎嶇的礁岩，但後來為了取咾咕石蓋圍牆，海邊的礁岩都被我們打平了，你看我們花了多少力氣在這件事情上。

我是農村子弟，因此綠島上的勞動工作對我來說，不算太嚴厲，主要是精神上的壓力，非常艱苦。當時新生訓導處第一任處長姚盛齋，我想他是為了邀功，發起了一項名為「一人一事良心救國運動」，要大家每個人自行舉報一件事，表達愛國救國的決心。這個運動除了隊上的外省人或軍人受刑人，很多人都不願意簽署，這種不配合的態度惹惱了姚處長，結果他藉機把一些平常會跟他搗蛋的人重啟調查，再次起訴，有一些獄友後來被送回臺灣槍決。另外還有一些人受到報復，例如我們五隊有個音樂隊，裡面很多成員在服刑期滿後居然又被送到小琉球關押一兩年。

在綠島還要接受政治思想教育，記得當時讀過的課本包括《國父遺教》、《領袖言行》、《中國之命運》、葉青¹⁰寫的《共產主義批判》、《中國歷史》、抗日題材作品，還有《蘇俄在中國》，都是一些政治洗腦的內容。

同學雜憶

我必須老實承認，在綠島時我有很深的自卑感，隊上八十幾名同學，¹¹至少有六十多人擁有大學以上學歷。有臺大、師大畢業的，還有醫生、船長、教授。看到大家的教育程度這麼高，而自己只有中學學歷，自卑感油然而生。這樣的感受，也促成日後竭盡所能想要栽培自己的孩子好好唸書的心願。

雖然我的同學各個是高知識分子，但每個人都很有修養，很客氣，不自私。例如有家人寄食物來，都會和大家分享不會藏私。當時同隊有一位同學叫做王福青，好像是上海人，他曾經當到福建省警察局長，據說因為政府下令抓人，但他不願配合，於是反被誣陷入獄，政府撤退時一併抓來臺灣，被判處無期徒刑，包括他的七名下屬一起被判刑。他是一個很正派而且慷慨的人，那時要是隊上發生

⁹ 指九臺尺，大約等於三公尺。

¹⁰ 葉青為當時臺灣著名反共理論家任卓宣（1896-1990）筆名。

¹¹ 綠島新生訓導處受刑人之間以同學互稱。

違規事件，他都二話不說一肩扛下。據說王福清曾經發誓，一定要等蔣介石和蔣經國先死，他才願意死。後來是蔣介石去世之後減刑，王福清才獲釋。就因為他為人好，在他回臺之後，好多同學都願意幫助他。據說他獲釋的時候，女兒本想接他回家裡住，但他為了不影響在空軍擔任要職的女婿，寧願一個人住到外面。這時綠島的同學都紛紛伸出援手，幫他找工作。當然，在團體中還是有「抓耙子」，這些人時間一久，大家都看得出來是誰。專門打小報告的「抓耙子」平常會得到一些好處，例如由獄方拿到牙膏之類。

出獄後

出獄後我最不滿的就是不斷要受到警察的監視騷擾。照理講判刑後我已經付出了十二年代價，但回到臺灣之後每半個月我就要到派出所簽到一次，而且當我要求職時，就有人會向雇主通報我有案底，要好好監視我的一舉一動，因此沒有哪家公司敢聘我。這段期間我還開過早餐店。後來我購買了日文的藥理書來自學，我沒讀過中文書，中學以前的教育都是日文。自學藥理之後我報考臺北市衛生局辦的藥理鑑定特考，取得藥理鑑定臨時藥商的資格，有了這個資格，我就可以開西藥房，生活開始慢慢順遂。就這樣後來我經營藥房三、四十年。在綠島的日子我還是學到了一些東西，譬如國語和白話文。原本我只會以日文書寫，從綠島回來之後，至少學會漢文。

我們在綠島受苦，事實上遠在臺灣的親人也同樣受著精神上的折磨，非常可憐。被捕的時候我還沒結婚，但那些已經有家室的難友，判刑確定後，幾乎都自動簽了離婚同意書。記得有一位難友叫吳昌惠，他才剛新婚兩個禮拜就被逮捕，他是艋舺人，刑期十年，他太太最後等了十年才和他團聚。另外我還聽說，有個難友在妻子到綠島探監時，勸他太太離婚重新嫁人。他這位妻子覺得丈夫不了解她，於是在搭船回臺灣的時候，跳海自盡。這是在綠島聽到的故事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

我快 90 歲了，記憶不好，經常有些事情想不起來。近兩年患了腸胃不適和便秘的毛病，我懷疑是不是得了大腸癌，但我也懶得去醫院檢查。我的三個小孩讓我很欣慰，都很乖巧上進，解嚴前我一直不敢跟他們說我去綠島坐牢的事，要到解嚴後，我才跟他們說。孩子的教育問題是我關心的事，我一直跟他們說如果

可以讀的話盡量讀，我會盡一切辦法籌錢，如果不想唸的話，那就去做工學技能。我開藥房後經濟比較寬裕，就為孩子布置了書房讓他們專心唸書。現在三位孩子都算是小有成就，一位現在中醫診所任職，一位是清華大學畢業的工程師，最後一位則是會計師。他們都很孝順，我感到很欣慰。不管再累再苦，我賺的錢都毫不保留的投資在孩子的教育上，看到他們的成就，我很心滿意足。當然這一切都是我在綠島認識那些高知識分子，所帶給我的衝擊，讓我下定決心往後定要好好拉拔自己的孩子出人頭地。

我太太是我小學同學，後來唸家政學校。出獄的時候我已經 38 歲，我太太當時還未嫁人，於是我們兩人就這樣結婚了。我同樣很感恩我的太太，她幫了我很多，她念的是稻江家政學校，當初要結婚前，她在太平町¹²附近做裁縫，也小有積蓄，當初開藥房她也拿出了許多資金。她一點也不嫌棄我的出身，我丈人一開始不太同意這門婚事，因為覺得我是被關過的犯人，丈人的姪子曾經在中國大陸待過，替我說情。後來我開了西藥房，最終才得到丈人認同，覺得自己的女兒沒有嫁錯人。孩子的教育很大一部分由太太督促，我的孩子品性很好，菸酒不沾，我本身也是不喝酒、不賭博，除了香菸是在 60 歲左右戒掉，酒和賭年輕時候就很厭惡，不曾沉迷。

從綠島回來之後，由於時時受到監視，所以我行事都很小心，避免惹上是非。比如說有一次我家附近淡水河堤防上張貼了一張攻擊政府的宣傳品，我馬上成為被懷疑的對象，還要比對我的字跡。一開始我還不清楚，後來才知道原來里裡面都有人暗中監視我的一舉一動，像是國民黨的地方小組，或是里裡的觀望人員，都會暗中注意我的言行。還好我是在地人，擔任里長的舅舅都會提醒我要注意，其他的親朋好友也會警告。當然有了家庭之後，一切都以孩子家庭為重，我也儘量小心，絕對不要多事，免得再惹禍上身。

¹² 日治時代臺北市行政區劃，位置大約在今日延平北路一段至三段附近。